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年第2期 JOURNAL OF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第22卷) (SOCIAL SCIENCE EDITION)

# “社区嵌入”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

王 越[1],刘 余[2]

(1.江苏省农业科学院 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江苏 南京 210014;2.南京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摘 要:** 使用嵌入性理论,从资源禀赋和社区治理两个维度出发,基于产业类型、组织结构和利益联结以及社区治理、社区文化和社区信任路径,解释合作社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新形势下,依托社区资源实现产业振兴的内在逻辑,进而构建合作社“社区嵌入”的发展路径。运用上述分析框架分析贵州省麻江县蓝莓专业合作社的案例,发现当地社区的自然资源禀赋条件直接决定了当地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产业选择,据此形成的不同产业使合作社在产业结构的嵌入中也有别于其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同时,村庄治理形成的良好内部信任机制和村庄能人培育是合作社社区嵌入的重要内生动力。目前脱贫地区合作社发展尚未达到理想状态,未来更要重视合作社发展与当地资源禀赋条件和社区治理结构的嵌入性,依托禀赋定产业,培育能人促发展,同时适时开展联合发展,以实现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提质增效。

**关键词:** 农民专业合作社;社区嵌入;脱贫地区;乡村振兴

**中图分类号:** F32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0202(2023)02-0051-11

## 一、合作社发展的再思考

农民合作社是农户为维护共同利益,自愿联合、民主管理的互助性经济组织,是当前农业农村推进共同富裕、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的中坚力量。经过多年发展,我国农民合作社不仅在激活要素资源、引领乡村产业发展等方面发挥了经济价值,也在组织带动小农户方面发挥了重要的社会作用[1]。2019年以来,中央多次强调农民专业合作社要向壮大产业、拓宽农民增收渠道的方向发展。2020年,习近平在吉林考察合作社发展时再次强调,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当前发展现代农业的有效组织形式,有利于提高农业综合经营效益。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社会化服务,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因此,在现实需要和政策推动下,各地因地制宜,积极探索合作社发展路径,助力乡村产业振兴。

在政府大力推动下,我国合作社数量从2006年颁布《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时的2.64万家,增加到2021年底的220余万家。然而,农民专业合作社在经过几年的“井喷式”增长后,并未实现规范化和高质量发展,其主要原因在于未能与当地社区资源有效整合,导致合作社的发展出现了偏离[2]。实践中,一些合作社在成立后短短数年就走向衰亡,一部分正在运营的合作社面临农户认可度低、参与度不高的困境[3],还有一些合作社表现出与现行规制不相符的表决权一人多票[4]、不按息顾额分配利润等[5-6]现象。以上问题的出现一方面是由于合作社成立往往由政府“自上而下”推动,农民在合作社发展过程中没有参与感,社区资源没有充分调动;另一方面,合作社发展未能与现有产业结构、市场主体等进行有效融合[7]。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合作社作为一种外

**收稿日期:** 2022-12-06 **DOI:** 10.7671/j.issn.1672-0202.2023.02.005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72103090);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71361140370);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2021SJA0275)

**作者简介:** 王 越(1994—),女,江苏南京人,江苏省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农村发展,E-mail:cynthiawang219@hotmail.com

生的制度,其生存和发展都需要一定的外部条件。

农村社会作为农业合作社发展所必须依存的外部环境,一方面,农村社区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决定了农业产业的类型选择,所选择产业的自然属性、资产专用性、技术门槛以及预期市场风险决定了合作社发展演化的路径。在我国先产业化后合作化的农业组织化发展背景下,合作社嵌入现有的产业结构要通过合理的外部市场交易与契约形式,充分分享产业链的价值增值,实现合作社在产业中的纵向深度发展[8]。同时,农户分化产生的成员异质性不可避免,合作社要连接家庭农场、规模经营户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利用不同合作社的资源优势在更广泛的范围和更高的层次上形成合作社联社,在产业链中获取更高的谈判地位和市场影响力[9-10]。另一方面,农户走向合作的行动逻辑离不开以"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为基础形成的"熟人信任"[11]。合作社根植于乡村社会,其发展理念、制度及具体实践能否与乡村社会的治理结构、社会资本、非正式制度相契合至关重要。在当前农村社会发生巨大变革的背景下,农村社区的有效治理重构了社区内关系,整合了社区资源,为合作社的发展提供了适宜的土壤。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不断推进和深入实施,具有企业家才能的乡村能人将发挥其自身的社会网络资源和在农村社区结构中的中心作用,为合作社的自主发展注入新的活力[12]。因此,农民合作社的发展必须要考虑其所处社区的资源禀赋条件及由此决定的产业特征,以及社区文化、社区信任、社区治理结构等现实条件。

本文试图回答的主要问题是合作社在发展过程中如何通过嵌入社区实现在现有产业结构和产业主体间的有效融合,从而最终促进产业的发展。与已有研究相比,本文的创新在于:基于新经济社会学的组织嵌入性理论,构建社区嵌入视阈下农民合作社转型发展的分析框架,并以贵州省麻江县蓝莓产业和蓝莓专业生产合作社为例进行案例分析,以期从社区维度的中观层次为农民合作社发展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为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转型时期下培育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提供实践启示。

## 二、合作社发展社区嵌入的逻辑与路径

本质上来说,合作社这一组织形式的存在与发展是一种"防卫性"应激机制,其成立动机在于建立农民的反垄断力量,在市场中获取一定地位和价格控制权,减少市场化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和外部性的不利影响,降低风险、不确定性以及交易成本,同时避免专用性资产投资受到机会主义的侵蚀[13]。这就决定了在当前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合作社的发展需要具备以下条件:一是合作社的产品具有差异性,大宗农产品的生产更容易标准化,农户只能被动作为市场价格的接受者;二是形成农产品品牌,使合作社在价值链中能够分享到更多利益;三是具备一定的发展初始资金和资源。然而现实中,我国大部分合作社在发展过程中往往缺乏具有企业家精神的领导者,也缺乏初始资金开展农民互助合作,外部资源环境对合作社的发展形成了高度制约。村庄作为一个兼具经济功能和社会功能的组织,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为合作社提供了必要的资源和资金,农村社区的有效治理强化了农户之间的信任,塑造了农户的集体认同,成为决定农业组织化形式的重要制度环境。基于此,在当前的社会经济体制中,合作社要成为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载体需要实现内部要素与外部环境要素的统一。

个体的行动是嵌于特定社会经济网络及其关系结构中的,具有持续性和动态性。从网络关系的视角出发,嵌入类型可以划分为关系嵌入(Relational Embeddedness)和结构嵌入(Structural Embeddedness)。关系嵌入是指单个主体的经济行为嵌入与其直接互动的关系网络中,个体依托该网络可以获取的信息和资源。关系嵌入可以由互动频率、感情强度、亲密程度和互惠关系四个维度划分为强关系、弱关系和强弱混合型关系[14]。结构嵌入则是指组织所嵌入的社会网络带来的超额价值[15]。依据中国农村的社会情境[16],乡村社会网络中同时存在差序格局与团体格局,由血缘地

缘强关系中的家庭家族和团体格局中弱关系联结共同构成了组织和群体之间的结构嵌入。两种类型的嵌入网络使得行为主体之间产生信任和互动,减少了机会主义行为的发生概率。

嵌入性理论为本文构建分析框架解释合作社如何在中观层面嵌入社区禀赋条件和社区治理结构提供了理论基础。外部力量嵌入是合作社发展过程中的主要动力,并通过市场机制、互惠机制、服务机制和社会网络机制的建构拓展了发展的生存空间[17]。组织嵌入性从关系嵌入和结构嵌入两个维度对合作社绩效产生影响[18]。除了社区环境与背景外,嵌入性通过社区内规范和习惯促进了合作社内部的知识流动和技能传播,提高了合作组织的集体行动能力[19]。

**(一)合作社发展对社区资源禀赋的嵌入**

资源禀赋对地方所发展产业的选择有重要决定作用,依托当地资源禀赋,地方将形成各具特色的产业类型以及适配该产业类型的联结机制。在此背景下,合作社的发展需要主动嵌入地方社区资源禀赋现状,构建其在市场竞争中的位置,在已有的产业结构中获取生存资源以拓展发展空间。一方面在外部的组织网络中寻找可依附的组织,迅速克服“新生劣势”,与不同经营主体通过市场交易机制和互惠机制强化合作关系,以适应产业的纵向一体化。另一方面,在合作社内部通过要素合约、关系契约、治理结构等增强合作社发展的主体性力量。

1. 产业类型与合作社发育

农业产业的类型选择影响了产业组织的发展路径。在城市要素向乡村流动时,工商资本更容易进入标准化生产程度高、资产专用性高、资本密集型的产业,例如肉鸡、生猪养殖等畜牧产业。因此,相比于形成合作社,此类产业更容易发展成为以农业龙头企业为主导的纵向一体化组织。对于具有区域性、依赖于当地自然资源、标准化难度较高的特色农业,工商资本不具有实现垂直一体化的优势。因此,将企业弱势的环节从产业链上剥离,由合作社承担该部分功能,形成介于市场和一体化科层制的网络化产业组织,即“龙头企业 + 合作社”是更具有效率的产业组织联合方式,也为合作社在产业中的嵌入提供了空间。产业的发展是合作社发育的基础,为适应外部市场环境,合作社需加入合适的系统使自身获得更强的生存能力。合作社与外部企业签订的商品契约构成了下游农产品收购企业对合作社产品的质量要求,合作社对内部成员采取相应的要素契约,通过统一种子、化肥、农药等投入品管理标准和生产过程中的规范,提升产品品质和标准化程度。

2. 基于纵向一体化的横向再联合

从市场关系来看,合作社的纵向协作程度反映了合作社在产业链中的嵌入程度。在先赋的产业化机制下,合作社虽然能联合小农户,但单个合作社力量有限。随着农产品国际国内两个市场的联动性加强,单个合作社在技术支撑、市场开拓、资金保障等方面能力不足,经营实力弱、抗风险能力低的问题不断凸显,在产业链中的地位不断被削弱。因此,合作社追求在更大范围和更高层次上的联合,以谋求在产业链中以更畅通的信息和资源共享、更强的议价能力,提高分工协作效率,拓展市场辐射范围,打破空间局限性。尤其是对于特色农产品来说,成立合作社联社能够有效发挥规模优势,实现不同生产要素的融合,发挥各合作社的优势,实现“报团取暖”。在合作社内部,通过不断培育规模经营农户,发挥“大农带小农”的示范作用。

3. 利益联结机制

当前,合作社的发展逐渐从成员导向走向市场导向,在农产品供大于求的市场格局下,农产品的终端消费需求多样化强化了合作社的市场销售功能。尤其对于特色农产品来说,提升合作社经营效益、增加合作社社员分红收益要求合作社不仅停留在提供服务的初级阶段,还要通过嵌入产业化经营,延长农产品的产业链和价值链,在农业的一二三产业融合中充分发挥作用,这就要求合作社与产业上下游各主体制定相应的行业生产标准与统一的规范,提高生产过程中标准化的程度。同时,为特色农产品打开高端市场提升农产品附加值,合作社可以通过联合产业链的龙头企

业等主体创建特色农产品区域公共品牌,以区域内独特的自然资源禀赋、生产加工方式为基础,形成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品牌战略联盟,加强消费者对特色农产品的认知,通过突出农产品的差异性构建产业链各主体合作共赢的价值创造体系。

**(二)合作社发展对社区治理结构的嵌入**

农业组织化具有多种道路选择,家庭农场、合作社、农业企业都是组织化的重要载体,选择何种方式实现农业组织化不仅取决于产业结构与特征,还取决于产业发展所处的村庄资源结构、治理结构和文化环境[20]。国际合作社联盟于1995年发布的《关于合作社界定的声明》提出"莱夫艾森原则",即关注社区是合作社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则。农民合作社是根植于农村社区的农民基层经济合作组织,其与社区发展的结构性嵌入是合作社各种经济联系所形成的的社会网络结构。合作社辐射范围、公共服务能力等反映了其与村庄嵌入的程度。

1.社区治理资源

农村社区的自然资源禀赋,例如地形地貌特征、水热条件是影响地区产业发展和选择的基础性制约因素。农户依据自身在土地、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禀赋结构上的差异选择进行以何种方式进行联合。其次,村庄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资源是合作社形成、发育的重要土壤,具有突出才能和村庄影响力的"能人" 在合作社的发育过程中往往起着"领头雁"的作用。从身份特征看,农村能人一般分为三种:一是农业生产经营中的大户;二是有在外务工或经商经验,获得一定资本积累后返乡创业的人员;三是村庄内"两委"村干部或村民小组组长。与普通村民相比,他们拥有经济资本和更多的才识,由于个人的工作经历积累了更多的人力资本(经营管理的经验)和不同于村庄内部人员的社会网络结构以及政治资源。在村庄内部,村庄能人自身具有较强的发展动力,有志于通过其特长带动乡村产业发展,并且具有较强的生产经营能力、宣传动员能力和声誉威望,有能力将村庄内人员组织起来。在村庄外部,村庄能人可以利用个人的社会资本和社会网络争取到政策资源和市场资源,为合作社准确识别市场发展机遇、推动生产经营创新奠定了基础和保障。

2.社区文化

社会规范、文化观点和特定组织形式形成"广为接受"的社会事实之后,会演变为规范个体行为的观念力量[21]。在由地缘、血缘构建的"熟人社会"中,由于长期协作,信息沟通、任务分解等能力在生产实践中逐渐稳定,并使"原子化"的村民结合在一起。在同一个社区中,农民由于遵守相同的习俗、道德规范,更容易形成超越个人利益的村庄认同与归属感,从而形成非正式制度型契约。这种对于村庄的集体认知是形成村庄社会资本的重要来源,已经建立起的成员间认同和联系降低了合作社成立和运转的组织成本,减少了合作社运行时失败的可能。乡村社会中的"人情""面子"以非正规方式形成了一套农户的声誉机制,强化了农户的心理监督,降低了农户参与合作社时"搭便车"造成的工作效率低下。

3.社区信任

村庄环境是影响合作社有效运行和发展的关键因素,特别是村庄中的信任机制、互惠机制、声誉机制和有效沟通是促进合作社内部有效持续发展的关键。在当前农业市场化的进程下,村庄内部的信任模式对于合作社的信任建构和合作社社员之间的互动性关系与互动性质量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农村社区在信任、关系、社会参与方面建设比较成熟,由于农民之间的交往是重复性博弈而非一次性博弈,发生欺骗行为的机会成本较高,较容易产生信任。信任可以划分为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22],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是影响农户参与合作社积极性、合作社有效运转的关键。人际信任基于人际交往的情感,产生于家庭、朋友、邻居等个体间的相互交往中,具有亲疏远近的特征。此外,我国现阶段的合作社发展是在政府的积极引导和推行下发展的,村委会和村干部是基层推进合作社发展的中坚力量,因此人际信任也包含农户对以村两委为代表的村庄权力信任。制

度信任则产生于个体人际关系之上,嵌入在村庄的特定场域之中,农民通过社区规范和规则,在彼此交往中产生社区秩序。村庄内部的信任重塑是乡村治理能力提高和向现代化转变的重要体现。在相互信任的环境中,基层社区才有凝聚力和一致行动能力,合作社各方的利益主体在协商议事上才能达成集体行动。信任并非仅仅是一种心理状态,而是包含利益的观念性认知,是一种在不确定性和风险状态下对互惠互利的期待[23-24]。

4. 社区治理

农民合作社作为一种互助性经济组织,可以为社员提供不可分的、普遍的利益,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合作社的发展是一种俱乐部产品供给。根据集体行动理论,当组织规模较大时,即使合作社的供给可以使团体内的所有成员受益,但由于公共产品的供给具有成本,对每一个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理性农户来说并不一定会采取共同行动成立合作社[25]。为达成合作组织的一致行动,需要充分利用社区治理资源,尤其是村庄能人、村干部等主体在村庄内部的威信和能力,将合作组织嵌入村庄治理结构中,实现优势资源互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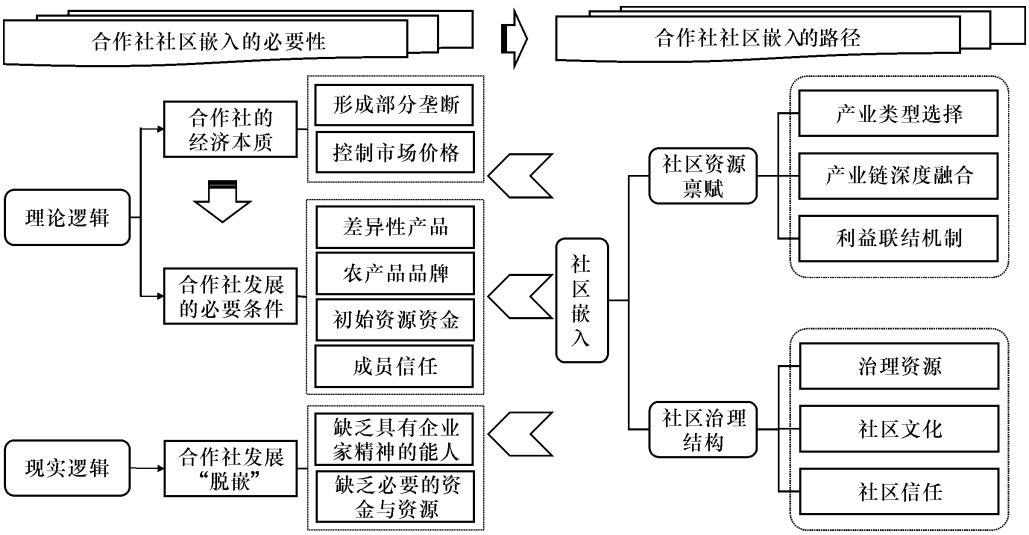



**图 1　合作社发展社区嵌入的逻辑与路径**

## 三、案例选取与基本情况说明

上述分析框架在理论层面解释了当前合作社发展需要嵌入当地社区资源禀赋条件和治理结构特征的逻辑。为了检验该框架对现实世界的解释力,需要选取与当地资源禀赋和社区治理有效融合的合作社为案例。本文所使用的案例来自于 2021 年 7 月对贵州省麻江县蓝莓产业和蓝莓专业合作社的实地调查。选取麻江县的蓝莓专业合作社主要是基于以下考虑:一是麻江县于 2019 年率先退出贫困县序列,是我国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地区,自脱贫攻坚以来形成了以产业帮扶为主的发展模式,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二是麻江县是我国南方蓝莓种植第一县,其蓝莓产业和蓝莓种植合作社在脱贫攻坚时期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期间经历了一系列转变,有助于深入考察合作社与产业发展的运行机制。三是麻江县村庄空心化程度较低,农村社区治理成效显著,有利于分析合作社发展与社区环境的互动机制。调查主要采用深度访谈的形式,访谈对象为麻江县农业农村局相关部门负责人、蓝莓产业公司负责人、主要村干部、合作社主要负责人和普通社员,调查内容涉及当地资源禀赋状况、蓝莓产业发展状况、村庄治理基本情况、合作社运行状况、治理机制等方面内容。

### (一)麻江县基本社会经济状况

麻江县地处贵州省黔东南自治州,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县,县内有汉族、苗族、布依族、畲族、仫佬族等30多个民族,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的80.8%。辖区总面积957平方公里,耕地面积31.33万亩,地形以山地为主,水热资源丰富,主要农作物有蓝莓、锌硒米、蔬菜等。全县辖2个街道办事处、4个建制镇、1个布依族乡,共63个行政村328个村民小组,总人口近17万人。2020年,全县农林牧渔业总产值19.98亿元,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10901元。

### (二)麻江县蓝莓产业及合作社发展演变

蓝莓产业是麻江县引进的特色产业,酸性土壤和以山地为主的自然资源禀赋特征为当地蓝莓种植提供了适宜的条件。2000年以前,麻江县主要以种植传统作物为主,包括小麦、水稻、玉米等粮食作物。2000年以后,为实现农业的高效发展,麻江县开始引入蓝莓种植。从产业组织发育程度来看,麻江县蓝莓合作社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2000年至2014年,蓝莓发展主要以"龙头企业+农户"的组织形式为主,在政府的主导下,麻江县从中国科学院南京植物研究所引进蓝莓种苗开始试种并取得成功,2003年建立种植试验示范园200亩,进而开始规模化育苗生产。由于蓝莓种植有较高的前期投入和资金占用,一般农户难以进入。麻江县通过引入浙江奉化以勒食品公司和香港百花公司,建设400亩商品化蓝莓种植基地进行生产。此后,麻江县云端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黔东南州万佳生态蓝莓有限公司、贵州蓝瑞农业科技公司等企业陆续发展,并通过生产基地的形式雇佣当地农户进行生产。

第二阶段:2015年至2019年实施脱贫攻坚战略以来,麻江县以产业扶贫为支点,政府通过平台注资成立贵州蓝之灵山地生态农业有限公司,以基层党建为引领,成立农民合作社。这一阶段,合作社成员基本为贫困户,合作社吸纳扶贫资源引导其参与蓝莓产业生产。这一时期合作社在资源有效配置和市场竞争中发挥的经济作用较弱,益贫性使其主要承担了扶贫的社会功能。

第三阶段:2020年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以村集体为主的蓝莓专业合作社开始发展。2020年,麻江县种植蓝莓7.60万亩,总产量0.653万吨,总产值达2亿元,产业覆盖7个乡镇(街道)53个村,带动农户1.1万户,参与蓝莓生产、加工、经营的企业达到29家、农民专业合作社46个、家庭农场30家、专业大户52户。

## 四、"社区嵌入"视角下麻江县合作社发育的案例检验

作为重要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麻江县蓝莓合作社在扶贫及乡村振兴的不同社会发展阶段承担了不同的功能,其组织模式也经历了一系列变迁。这种发展路径并非个例,本部分将结合案例资料,分析如何激发合作社发展动力及其与当地资源禀赋和社区治理互适的嵌入机制。

### (一)基层社区治理势能:合作社嵌入的内生动力

政策倾斜与行政赋权是合作社发育的"第一推动力"。尽管"罗虚代尔原则"表明合作社的发展一般遵循"自下而上"的规律,依靠农户的联合自发形成,但在具体实践中,由于农户分化水平较高、小农广泛存在,在生产剩余较小的情况下农户支付合作成本、不依靠外部组织的力量自发启动合作并不现实,行政推动下的合作社发展路径是国家权力推动农民组织化发展的合理制度性选择[26]。在合作社发展过程中,政府一方面在国家法团主义的框架下为合作社的合法性进行赋权[27];另一方面通过扶持政策和监督政策双管齐下,推动合作社的经营管理走向规范化和市场化。在全面实施脱贫攻坚战略时期,合作社天然的"益贫性质"使其成为政府资源嵌入乡村社会的有效工具[28]。

麻江县蓝莓产业的合作社发展是在基层政府鼓励和村两委的积极参与之下逐渐发展起来的。脱贫攻坚时期,合作社发展主要以基层党建为核心,通过"党社合一、村社共建"带动贫困户脱贫增

收。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新形势下,为增强蓝莓产业内生发展动力,提高产品市场竞争力、实现产业振兴,合作社亟需实现从“自上而下”发展模式向内源式发展转型。依托社区长期善治带来的势能,农户对以村干部为主的村庄权力具有高度信任感,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村庄一致行动能力,减少了合作社嵌入时社区集体行动的对抗,降低了制度成本。实现规模化经营是蓝莓合作社转型发展中面临的主要困境,为推动土地流转,合作社理事会成员由村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等在内的村两委“六大员”兼任,通过社区治理过程中村干部与农户积累的个人情感连接与信任,降低了土地流转过程中的沟通与交易成本。2021 年,麻江县制定《蓝莓产业合作社改革实施方案》,引导 11 个千亩蓝莓村组建新型蓝莓生产经营管理农民专业合作社。同时,为保障合作社可持续发展,村集体资产也入股其中,依托村庄内部治理形成的关系强链接、交易低成本和规范强约束,形成了市场利益与社区合力,实现合作社转型与乡村自我发展的内在整合。

**(二)能人效应与关系嵌入:合作社发育的乡土资源**

村庄能人是合作社的主要管理者,也是社会关系的联络者,不仅掌握了村庄的经济资源,同时也拥有更多的政治资本。在乡土社会的熟人关系网络中,通过塑造非正式的权威,借助其关系网络,能有效与小农户的需求对接,形成经济示范效应,带动其他农户进行横向的联合[29]。麻江县村集体经济发展薄弱,在村庄治理资源有限的约束下,村庄能人成为推动合作社发展的核心因素。麻江县推动合作社发展的能人有两类:

一是村干部型能人。村干部型能人具有合作社运营的核心稀缺资源,同时具备了企业家才能和担任村干部所积累的行政资源。JZ 街道 XB 村 P 支书兼具村干部和村庄能人的双重身份,在合作社经济利益诉求与上级政府政绩考核的目标上具有激励相容的一致性,能较好完成上级下达的指标,与上级领导及政府部门形成了长期的良好互动,为合作社运营争取了相关的政策支持和社会资源,使 XB 村成为了首批 11 个蓝莓种植千亩基地。同时,其凭借长期积累的个人声誉和威望,赢得了村民的信任。尽管 P 支书是外部嵌入型村干部,依靠国家政治权威赋予的治理权责,但在日常工作中积极调动村民参与村庄事务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化解了村庄内部的矛盾,优化了村庄内部的治理结构,为合作社的发展减少了内部摩擦。相比于资本下乡的外来企业家,村干部型能人更容易取得农户的信任,其组织动员能力也使合作社在发展过程中更具有成本优势,能有效克服农户之间的“组织困境”。村干部的政治身份则能快速识别各级政府对合作社的政策优惠和财政资源,为合作社的发展争取更多的社会支持。

二是返乡创业型能人。乡村振兴人才是关键,返乡能人作为新主体为合作社发展奠定转型基础,为合作社发展注入新的思想和理念,成为合作社发展的有效驱动力。麻江县实行了“一村一人”经纪人计划,返乡创业型能人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麻江县以“春晖行动”吸引本县籍致富能人返乡创业,对农村经纪人展开技术培训、营销策划培训等。XW 镇 WB 村民 YQX 是本村的内生型能人,在县政府推出蓝莓种植补助政策扶持下,返乡创业种植蓝莓,成为本村蓝莓专业合作社的主要管理者。通过在外地务工时积累的个人社会网络和管理经验,整合了村庄内资源,建立了电商销售平台,并带动其他农户加入合作社。返乡创业型能人向村庄的转移逐渐打破了原来以村干部为主体创办合作社的单一模式,这一群体自身在生产经营中有较强的发展意愿和能力,也能够充分利用在非农务工经历中积累的人力资本和社会网络资源,有效克服了合作社发展羸弱、涣散的弱点。同时,由于其乡土情结,在合作社生产经营中能更有效发挥“领头雁”优势,在周边农户中形成示范合力。

**(三)组织模式与利益分享:合作社的产业关系嵌入**

产业组织是实现产业振兴的重要主体,生产组织模式是合作社嵌入产业关系网络中的重要形式。在产业化发展的背景下,合作社作为公司与农户间的纽带主要从两个方面嵌入产业发展:

一是与产业链主体间的契约关系。合作社深刻嵌入在不断变化的市场结构中,在工商资本不具有垂直一体化优势的区域性、特色化、非标准化农产品生产中,合作社承担部分企业在产业链上弱势环节的功能,形成"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更具效率的产业组织方式。蓝莓产业发展初期主要以"龙头企业+农户"模式为主,农户不承担生产风险和经营风险,但也无法从产业发展中获益。由于蓝莓种植机械化程度较低,企业高度依赖村庄劳动力。因此,在这一产业结构中合作社有了发展契机,农户通过土地和劳动力入股合作社,与企业达成"固定租金制"的契约关系。蓝莓种植周期较长、前期资金投入较大且具有较高的技术门槛,是典型的具有资产专用性的产业。企业通过土地流转形成蓝莓规模种植基地,在不产生收益的前3年支付每亩600元的管理费用委托合作社雇佣农户管理果园。从第四年开始,企业将蓝莓种植基地交由合作社管理并由合作社制定管护认领方案。合作社在村集体的协助下,组织农户对托管的蓝莓基地进行认领。蓝莓种植基地日常管理由合作社社员负责,肥料、农药等农资投入由公司统一采购后赊销给农户使用。在这一产业链主体的嵌入中,合作社通过外部市场契约和内部要素契约同时连结了龙头企业与农户,利用外部产业发展的基础为自身发育拓展了生存空间。

二是不同主体间的利益分配机制。利益联结是实现共赢发展的粘合剂。实践中,为保障农户在产业链增值中获益,合作社制定了分红机制激励社员积极参与合作社运营。蓝莓生产的净收入由公司、合作社和农户按照45%、5%、50%的比例在年底进行收益分配,公司所得45%的分配收益中40%用于支付土地所属的农户分红。公司分配收益所得扣除管理成本后,按公司与合作社及农户签订的土地入股协议所约定的公司占股60%,合作社及农户占股40%进行再次分红。以合作社为纽带,通过确定不同主体间的利益分配机制,实现了农户在产业链中的稳定收益,促进产业链多元主体由松散型转向紧密型利益联结。

**(四)技术指导与品牌建设:合作社的市场功能嵌入**

作为集经济功能和服务功能于一体的组织,合作社通过从外部市场环境中攫取生存资源以构建其在市场竞争中的位置,拓展其生存空间。合作社内部在生产合作和供销合作上的协作紧密程度反映了合作社基于横向联合基础上的纵向一体化程度。这一纵向协作又通过对技术、品牌营销等价值链环节的占据影响了合作社的收益水平[30]。

随着农业生产商品化、分工多元化程度的提高,贯穿产业链的生产性服务是合作社将小农户融入现代化大生产之中的重要途径。蓝莓作为特色农产品,具有较高的生产准入门槛,尤其是种植过程中品种选育、修剪技术直接影响了蓝莓的产量和品质。麻江县合作社与产业链中的其他经营主体进行联合,全县46个蓝莓产业专业合作社联合29家企业、25个家庭农场、2535户种植户与贵州生物研究所、贵州大学成立了贵州省蓝莓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共建共享生产、加工、销售信息,带动合作社内部提升技术。通过制定《麻江县蓝莓产业技术服务工作方案》,合作社联合县蓝莓发展服务中心、农业龙头公司组成专门的麻江县蓝莓技术服务队,对全县46个蓝莓种植村开展技术服务工作。合作社将先进的品种、生产技术、装备等现代化生产要素引入生产过程,提升了单个小农户的生产效率,尤其是对于有技术准入门槛的特色农产品,合作社的服务功能嵌入实现了要素高度融合。

建立农产品品牌,实现价值链增值是合作社市场功能嵌入的另一重要表现。传统农产品品牌效应形成周期长,在产业发展初期品牌难以建立。为拓宽销售渠道,增加蓝莓产品的附加值,蓝莓专业合作社与各产业链主体共同创建并使用"麻小梅"县域公共品牌,以提高蓝莓品牌的知名度,完成了36个类别"麻小莓"的标注,建立了"麻小莓"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线上专卖店、商品三级分销系统。同时,制定了《"麻小莓"区域公共品牌使用管理规则》《"麻江地理"标志认证证明使用管理规则》等行业准则,规范区域公共品牌的使用。合作社作为具有较强协调能力的经济联合组织

在进行农产品品牌建设时有标准化管理、品牌推广和渠道选择优势,能够有效提升农产品价值,形成区域规模经济效益。

**(五)案例小结**

地域性和产业性是合作社发展的基本准则,脱嵌于这两者的发展路径必然导致合作社出现“异化”“泛化”等问题。以上对于麻江蓝莓合作社的案例分析表明要解决合作社在发展中面临的问题就要协调与产业发展及社区发展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对于政府主导下形成的合作社,从行政力量到市场机制主导的转变过程中,合作社在社区嵌入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1. 麻江蓝莓专业合作社的转型与发展展现了较强的社区性

由于山区的地理特性和资源属性,农业生产难以通过大规模土地流转实现规模经营,当地农户保留了较传统的生产方式。农业经营性收入是家庭重要收入来源的情况下,村庄的劳动力外流情况并不严重。因此,社区建构较为完整,即使在村庄集体资产薄弱的情况下,村庄治理的方式和内容依然与农民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农民参与村庄社区治理的积极性较高,村庄内部的资源和治理结构将进一步影响农民参与合作社的行为。当合作社发展转型受到产业化组织的资本冲击时,可以充分利用社区的资源和治理功能联合合作社社员进行抵抗。同时,村两委干部参与合作社治理,村庄的有效治理能促成合作社成员的一致行动能力,对外更容易与龙头企业谈判达成一致,获取更优惠的条件,对内能够组织合作社成员,减少交易成本和监督成本。合作社的经济关系与村庄内部的熟人社会结合,构建了一个“利益—关系”网络。

2. 特色农产品的属性为合作社在纵向一体化的产业合作中发掘了发展空间

与其他农产品相比,麻江蓝莓具有较强的区域特征,优质的蓝莓生产依赖于当地的自然资源和气候条件,蓝莓生产过程难以标准化,机械操作难度较大,对劳动力的依赖强度要大于对资本的依赖强度,因此工商资本力量无法深入渗透其中形成高度纵向一体化的产业组织,从而有利于合作社的发育。但同时,蓝莓种植的长投入回报周期和高资产专用性又决定了其难以依靠农户自身进行投资,产业发展的基础是合作社得以发展的先决条件。龙头企业、合作社与农户三者之间建立起了外部市场契约和内部要素契约的交易关系与合作机制,并通过土地入股参与分红、产品品牌效应和保护价格收购的方式强化了三者之间的利益联结。

3. 蓝莓合作社离标准的合作社还有一定差距,但是当前条件下的合理选择

麻江蓝莓合作社是在各村脱贫攻坚功能载体上发展演变而来的,通过农民的土地入股,在功能上主要实现产销的基本服务,与当前集体生产合作、信用合作、供销合作“三位一体”多功能的合作社还存在一定差距。同时,合作社内部的治理结构和盈余分配上也与标准合作社“所有者与惠顾者统一”“盈余属于惠顾者”等原则有差异。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任何产业组织形式即是一种制度,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如果找不到一个比现有组织模式更加可行的组织形式,那么现有的组织形式就应被看作是有效的[31]。因此,尽管麻江蓝莓合作社的功能和运作模式与标准的合作社范式还有一定的差距,但是是在当前的条件和背景下的合理选择,是符合当地发展条件的农业生产组织方式。

##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嵌入性理论,运用贵州省麻江县蓝莓产业的典型案例分析,剖析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合作社如何突破自身发展的限制,嵌入当地的资源禀赋条件和社区治理资源以实现自身治理结构和治理功能的转型与发展。研究表明,合作社的发展路径是当地社区资源禀赋和治理结构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方面,当地的自然资源禀赋决定了适宜发展的农业产业类型,而不同类型农产品的特质与属性往往直接影响农户在面对市场时的谈判能力。适应麻江县资源禀赋发展形成的特色农产品更难以形成完全竞争市场,买方处于更优势的地位,因而农户有更强的

动机组成合作社“抱团取暖”,这也成为促进农业产业组织分化的重要因素。因此,在产业纵向一体化发展的基础上,合作社想要转型发展,需要嵌入由当地资源禀赋条件决定的已有的产业结构中。一是通过关系嵌入发展规模经营主体,在更高的层次上形成同业合作社联合,提升在产业链中的谈判地位和更高比例的利益分享;二是通过与其他产业主体合力发展形成区域品牌,提升市场影响力和产品附加值。另一方面,在乡村振兴战略不断推进的背景下,合作社的转型要充分利用社区资源,与农村社区治理有机衔接。社区的治理能力和结构决定了农户的集体一致行动能力,形成了合作社发展的内生动力,较高的社区认同感和社区信任有助于促进合作社的组织,降低合作社运营过程中的交易成本和监督成本,村庄内的经济型能人和政治型能人是合作社发展和良好运营的重要推力和必要保证。

上述研究结论对当前乡村振兴下发展新型农民专业合作社有如下四点启示:一是要重视合作社发展与当地资源禀赋条件,以及由此决定的现有产业结构的互适性,尤其对于特色农产品来说,要引导合作社加强与农业龙头企业合作。二是要重视社区的治理结构和治理资源对合作社发展的影响,加强社区的文化建设,在社区治理中加强树立合作意识和社区认同感。三是要发掘和培育村庄能人,鼓励基层村干部、返乡创业能人、乡土能人等积极融入合作社发展,为其提供市场拓展、技术赋能、融资等服务保障。四是要培养合作社联社,合作社的发展最终还是要以同质化程度较高的规模经营户为主体,在每个村以规模经营户为主形成专业合作社,在县级层次形成合作社联社,建立良好的利益分配机制。

**参考文献:**

[1]孔祥智.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本内涵与政策建议[J]. 改革,2016(2):104 - 115.
[2]张琛,孔祥智. 组织嵌入性对农民合作社绩效的影响研究——基于多案例的实证分析[J]. 财贸研究,2019(2):64 - 73.
[3]潘劲. 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数据背后的解读[J]. 中国农村观察,2011(6):2 - 11,94.
[4]应瑞瑶. 合作社的异化与异化的合作社——兼论中国农业合作社的定位[J]. 江海学刊,2002(6):69 - 75.
[5]黄祖辉,邵科. 合作社的本质规定性与其漂移[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4):11 - 16.
[6]黄祖辉. 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农业产业组织的变革与前瞻[J]. 农业经济问题,2018(11):61 - 69.
[7]马彦丽,何苏娇,高艳. 以乳品加工企业还是以奶农为核心——中国奶产业链纵向一体化政策反思及改进思路[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6):146 - 156,162.
[8]郭斐然,孔凡丕. 农业企业与农民合作社联盟是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衔接的有效途径[J]. 农业经济问题,2018(10):46 - 49.
[9]姜长云. 龙头企业与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发展关系研究[J]. 社会科学战线,2018(2):58 - 67.
[10]郭利京,仇焕广. 合作社再联合如何改变农业产业链契约治理[J]. 农业技术经济,2020(10):103 - 114.
[11]赵泉民,李怡. 关系网络与中国乡村社会的合作经济:基于社会资本视角[J]. 农业经济问题,2007(8):40 - 46.
[12]韩旭东,王若男,郑风田. 能人带动型合作社如何推动农业产业化发展? ——基于三家合作社的案例研究[J]. 改革,2019(10):98 - 107.
[13]BIJMAN J, HENDRIKSE G. Cooperatives in chains: institutional restructuring in the dutch fruit and vegetables industry[J]. Journal on Chains and Network Science, 2003(2): 95 - 107.
[14]GRANOVETTER M.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J].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85 (3): 481 - 510.
[15]GULATI R. Alliance and networks[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998 (4): 293 - 317.
[16]BIAN Y. Bring strong ties back in: indirect ties, network bridge, and job searches in China[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97 (3): 366 - 385.
[17]李婵娟,左停. “嵌入性”视角下合作社制度生存空间的塑造——以宁夏盐池农民种养殖合作社为例[J]. 农业经济问题,2013(6):30 - 36,110.

[18]张琛,孔祥智. 农民专业合作社成长演化机制分析:基于组织生态学视角[J]. 中国农村观察,2018(3):128 - 144.
[19]TREGEAR A, COPPER S. Embeddedness, social capital and learning in rural areas: a case of producer cooperatives [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16(44): 101 - 110.
[20]潘璐. 村集体为基础的农业组织化——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的一种路径[J]. 中国农村经济,2021(11):112 - 124.
[21]周雪光. 组织社会学十讲[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22]LUHMANN N. Trust and power[M]. New York: John Wiley and Sons, 1979.
[23]SCHMIDT D, SHUPP R, WALKER J M, et al. Playing safe in coordination games: the roles of risk dominance, payoff dominance and history of play[J]. 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 2003(42): 281 - 291.
[24]FODDY M, PLATOW M J, YAMAGISHI T. Group-based trust in strangers: the role of stereotypes and expectations [J].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09 (4): 419 - 422.
[25]曼萨尔·奥尔森. 集体行动的逻辑[M]. 陈郁,郭宇峰,李崇新,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26]徐旭初. 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辨析:一个基于国内文献的讨论[J]. 中国农村观察,2012(5):2 - 12,94.
[27]徐旭初. 农民合作社发展中政府行为逻辑:基于赋权理论视角的讨论[J]. 农业经济问题,2014(1):19 - 29,110.
[28]罗于. 决胜攻坚阶段农民合作社精准扶贫的困境和出路[J]. 农业经济问题,2020(11):55 - 64.
[29]卢青青. 嵌入性干预:农业现代化发展中的政府行为——基于甘肃城县苹果产业发展的经验阐释[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1):64 - 73.
[30]ZHONG Z, ZHANBG C, JIA F, et al. Vertical coordination and cooperative member benefits: case studies of four dairy farmers' cooperatives in China[J].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2018 (1): 2266 - 2277.
[31]WILLIAMSON O E. The mechanisms of governance[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 Community Embeddedness and the Developing of Farmer Cooperative

WANG Yue[1], LIU Yu[2]

(1. *Institute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and Development, Jiangsu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Nanjing* 210014, *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s, Nanji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Nanjing* 210023,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Embeddedness Theory, along with resource endowment and community governance, this paper explained the internal logic of how cooperatives revitalize with industry type, organization structure, interest alliance, community culture and trust. Additionally, it constructed a development path of cooperative transformation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of implementing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Further case analysis in Majiang County showed that the industry of cooperative in this region is determined by local attributes and natural endowment. This trait further shapes its structural embeddedness in the industry,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other agricultural entities. At the same time, trust and rural elites derived from effective community governance is also an important driving force for cooperatives. Currently, development of cooperatives in the poverty alleviation areas is far from ideal status. More importance should be attached to the linkage of cooperatives and community governance, as well as capable brains in the local. Cooperatives can also collaborate together to improv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their development.

**Key Words**: cooperative; community embeddedness; poverty alleviation area; rural vitalization